

(京)新登字 117 号

**李达军事文选**

《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125印张 12 插页 420 千字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 5065 2312 4/E·1190

定 价：20元(精)

17.5元(平)

## 序 言

在《李达军事文选》即将出版之际，让我写几句话，我是很乐意承担的。我认为，这本文选总结了历史经验，为我军建设又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

李达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担任过各种重要的领导工作，他建树的革命业绩是多方面的，但人们往往用“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来概括李达同志的特殊贡献。我想，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大部分经历都离不开“参谋长”的岗位：在红军中担任过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12月接替倪志亮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尽管他还先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兼任过云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和国家体委的副主任等等，但给人的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仍是一个“老参谋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人们说李达同志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还因为他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李达同志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军事家直接领导下前后工作了十六年，这

十六年，正是军事斗争十分严峻复杂、我军战略战术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的年代。作为参谋长，在刘邓指挥的许多大小战役中几乎都倾注着李达同志的心血。也正是作为刘、邓的参谋长，他在自己著述里的很多方面反映了刘、邓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辩证法。这也是本书所收的文章的价值所在。

我同李达同志自在援西军、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建立以后就接触越来越多，他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身上最突出的是政治强和业务精。他事事按党的政策办事，吃苦在前，不计名利，严以律己，处事公正求实，深受同志们的敬重。他热爱本职工作，善于接受新事物，精通业务，特别是做到知己知彼，能及时向领导提供可选择的方案，深为刘、邓所器重。我以为，像李达同志这样的好领导、好党员、好干部，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其它各条战线上，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今天新的长征路上，都是广大干部的好榜样！我相信，这本内容丰富的文选必将对广大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产生积极的良好影响。

宋任穷

## 目 录

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 .....	( 1 )
誓师抗日,东渡黄河 .....	( 13 )
记辽县游击训练班 .....	( 23 )
从收复黎城涉县战役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与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	( 29 )
百团大战——中外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	( 34 )
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 .....	( 48 )
关于整训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 .....	( 92 )
参谋长会议的报告提纲 .....	( 99 )
太行第二军分区 1942 年春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	( 111 )
要关注机关战斗化 .....	( 118 )
太行区粉碎敌人“扫荡”的主要经验 .....	( 127 )
祝伯承师长五旬大寿 .....	( 132 )
响应叶参谋长“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 .....	( 133 )
加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之商讨 ——5 月反“扫荡”的部分经验总结 .....	( 138 )
1944 年的战争指导问题(摘录) .....	( 162 )
在抗战第七周年中,我们怎样坚持和扩大了太行根据地 .....	( 174 )
怎样执行 1945 年战斗活动的任务 .....	( 182 )
关于进攻作战中的一些问题 .....	( 186 )
谈安阳战役经过 .....	( 193 )

##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

- 上党战役····· (195)

##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二仗

- 平汉战役····· (210)

- 一年来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工作(摘要)····· (223)

- 三破邯郸梦,三出陇海线····· (231)

- 在训练科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244)

- 回顾定陶战役····· (247)

- 王克勤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258)

- 关于进入新区作战的卫生工作指示····· (265)

-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 (269)

- 大别山四个回合的斗争····· (273)

- 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 (281)

## 百万雄师过大江

- 回顾第二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307)

- 解放大西南之战····· (331)

- 贺龙同志在西南····· (340)

- 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352)

- 再论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364)

- 在西南军区英模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377)

- 庆祝新中国胜利建设一周年····· (380)

- 1951年的迈进目标····· (384)

- 关于干部工作的几个问题····· (387)

- 在西南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92)

- 发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 (397)

- 为继续兴筑人民铁路而努力····· (400)

## 在已有的传统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军

- 纪念“八一”建军节24周年····· (404)

## 加强云南边防工作

- 在西南军区干部会上的报告(摘要)…………… (407)

## 西南军区部队的工作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412)
- 在西南军区公安部队首届运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416)
- 在西南军区汽车驾驶员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18)
- 在全军射击战术集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21)
- 战斗训练中的全面规划与统一领导问题…………… (423)
- 改善指导思想,加强训练行政…………… (426)
- 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38)
- 和运动员谈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问题…………… (447)
- 在运动队中树立革命的战斗风格…………… (454)
- 在白城地区打坦克演习结束时的讲话…………… (460)
- 在参观新疆军区师进攻战术演习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470)
- ## 伟大的历史转折

- 学习毛主席《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476)
- 悼念任弼时同志…………… (487)
- ## 我党我军一英才
- 纪念左权诞辰 80 周年…………… (489)
- 缅怀张浩同志…………… (494)
- 记蔡树藩同志二三事…………… (499)
- 附录:李达同志生平…………… (502)
- 编后…………… (506)

## 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sup>\*</sup>

1934年盛夏时节，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sup>〔1〕</sup>于7月23日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

红六军团当时共有9700余人，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8月7日，我们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艰辛的西征之路。12日，我们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并由任弼时宣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委。

但是，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且非常准确。我很奇

---

\* 本篇是李达同志1979年为纪念贺龙同志逝世10周年而作，后经修改充实，发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

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红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直到9月26日，朱德同志给“任、萧、王”发来“火急”电，我们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行动目标。电报说：“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方向前进。”并确定我们的路线：“由现地域或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

依据这一指示，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部队，与追堵我军的湘军、桂军巧妙周旋，且战且走，途经湖南、广西，进入贵州。

10月3日，军委电示任、萧、王：“桂敌现向南开动”，“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来电令，迅向江口前进。”4日，军委又电：“黔敌柏辉章师现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我贺部追击，其兵力正形分散。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并相机攻击堵敌部队。”

为执行军委上述指示，军团首长命我带领由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担任前导任务。我们6日进至石阡地区，7日继续行军至甘溪，与桂军廖磊所部第十九师遭



遇。原来，桂敌并未“南下”，而是——一直在追踪，当发现我们之后，突然抄后路，切断了我们与主力的联系。由于当时我们以为桂敌已经南撤，只顾向江口急进，和红二军团会合，所以没有和桂军作战的思想准备。加之，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事先也没有得到情报，待发现桂敌的前卫部队时，已经深入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重兵包围之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指挥先头部队与敌军奋力苦战，坚持到黄昏之后，我带着机枪连冲出敌围。其余部队也相继冲了出来。我清理了人数，只剩下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的两个团部和机枪连，总共400人左右。许多同志在突围中失散了。我们从一个叫作大地方的镇子，钻进了山沟。所幸这一带林深草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我们同敌人周旋了两昼夜，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我们与军团首长失掉了联系，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和第四十九团政委晏福生、第五十一团团团长苏杰等同志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折回去寻找主力部队（主力也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则很可能在途中重陷敌围，亦有被歼危险。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寻找红二军团，而据当地老乡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距江口、印江只有三五日行程。如果我们能很快找到红二军团，请求贺龙同志派部队接应红六军团主力，比我们这400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于是，我们在无法与军团首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先寻找贺龙同志。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人临时编成了1个先遣支队，直奔北方。10日到江口时，没有发现红二军团的踪迹。于是，11日经德旺，12日沿梵净山西麓继续寻找。在甘龙口附近，我们听老乡说，这一带常有部队活动，既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像土匪。对于梵净山，我是早闻其名的。它位于江口县北、印江县东，海拔近2500米，山势奇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是历史上土匪出没较多的地方。为了不致弄错，我又找了些老乡，仔细地询问了一下。从他们提供的零星情况来看，在梵净山西北一带，很可能有红军活动。

10月15日，我们又进一步打听到，在沿河县一个叫枫香溪的镇子附近确有红军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忘记了连日的辛劳，恨不能立刻见到他们。我重新整理了部队，就直奔枫香溪。经过来安营，又走了大约半天的路程，就看见一座小山头，上面有部队在活动，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由于我们红六军团穿的是制式军装，事先又未联系，他们误以为是黔军又来搜山，就作出了戒备行动。为避免发生误会，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我观察对面山上这些老乡打扮的部队实施戒备动作时，很像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所以断定他们就是红二军团的部队。于是，我就派人向他们喊话：

“我们是红六军团，从根据地出发，来找你们会师的。不要误会——”

“你们是红二军团吗？我们是来找贺龙总指挥的——”

喊了一阵，对面山上派人来跟我们接头。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垫着文件包，匆匆写就一封信：

“贺总指挥：

我们是红六军团，奉军委命令，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前来寻找红二军团会合的。我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面，希望同您会面。”

我将信折好，交给来人。他们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对于贺龙同志，我虽久仰其名，但从未见对面。他是否知道中央派红六军团来会合，我也拿不准。如果接不上头，或者虽然接上了头，但不能马上派援兵，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对得住正率部队浴血苦战的任、萧、王首长呢？

我正想着，忽见山上下来几个人，朝我疾步走来。最前边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脚踏草鞋，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深灰色的衣服。他走到我跟前，笑着伸过手来，我迎了上去。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他拽着身旁一位瘦削而精干的中年人，说：“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

关政委也热情地同我握手，并亲切地说：“李达同志你们辛苦了！弼时同志来了吗？”

我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

贺龙、关向应同志听罢，立时紧锁双眉。贺龙对我说：“李参谋长，你先把队伍带上山休息。”

“我还是先向您汇报部队被围的情况吧。”

于是，我边上山，边向贺、关首长汇报了红六军团寻找他们的经过，特别将我们在甘溪遭到敌军袭击的情况，详细地讲了一遍。

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为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红六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一块儿了。”

我说：“贺总，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

贺龙爽快地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他用力一挥右臂，对部队说：“明天就出发，接应六军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他那平易近人、豁然大度，在危难之时毫不迟疑地援救兄弟部队的豪爽气概，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还萦绕在眼前。

## 二

第二天一早，贺、关率领部队，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我们这支先遣队仍然担任前导。途中，我们了解到红六军团主力已经摆脱敌人，朝梵净山方向去了。我们又折回来，大约转了一两天的样

子，在梵净山西南发现一支部队，经用军号联系，原来是郭鹏、彭栋材同志率领的第五十团。我给他们介绍了贺、关首长，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第五十团的同志们争着同贺、关首长握手。许多同志拥抱在一起，不知说什么好……。

郭鹏、彭栋材同志说，他们团同主力失去联络后，既无地图，也不知道红二军团的位置，转了好几天，偶然从一个破纸堆里翻出半张旧报纸，上面登着贺龙所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向蠢动”的简短消息，这才有了具体目标，一路找来，果然同你们相遇。

我们稍事休息，便一同沿梵净山西麓向北继续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大概又转了一两天，终于10月24日在木黄找到了他们。两个军团的同志虽然以前多不相识，见了面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握手，拥抱，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小鬼们手拉着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

我陪着贺、关和任、萧、王首长亲切交谈。贺龙特别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因为电台坏了同中央断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的具体位置。这下可找到你们了。看见你们安全脱险，我也就放心了。你们来自井冈山，来自毛泽东身边，可要好好给我们介绍经验哪！”接着他和关政委关切地询问了红六军团脱险经过。

王震政委见了我，百感交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

任、萧、王首长经过十几个昼夜的辗转奔波，疲劳过度，特别是任弼时和萧克同志已经走不动路了。贺总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行军。

在行军途中，王政委跟我说，10月7日在甘溪时，被敌人截成了三段。他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高山临时开路，行军一昼夜，到达包溪。我第十八师和敌军打了半天。他们走到路腊，又遇到敌人，

我尖兵缴了敌人6支驳壳枪，主力仍在高山与敌人对峙。这时，已经减员六七百人。到了12日，为了避免被敌人追击，行动方便，他们将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烧掉了不必要的行李。经过施秉附近时，又被桂敌追了20余里。10月15日，他们向板桥前进，准备渡石阡河。但敌李觉部已先到板桥堵击。他们避开敌人，又折返甘溪，第五十二团在龙塘被敌截断，又退至白沙方向。17日晨，他们到达甘溪。午后，强行通过了敌军在石阡、镇远设置的封锁线。这样，经10余天转战，终于摆脱了敌军，在印江县的木黄同我们相遇。弼时同志身患痢疾，还手拄木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行军。听了这些，我非常感动。

回想起甘溪遭遇战，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红六军团被桂、湘、黔3省联军重兵包围分割，仍能各自为战，杀出一条血路，同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这是与任、萧、王首长平日对部队的培养、训练，和临战时的机智指挥分不开的。后来，我曾读到两份敌军总结为何未能追上红六军团主力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湘军旅长胡达的谈话。他认为所以未能追上和消灭红军，是因为这个部队确有一些“长处”，“如服从命令，拥护首领，完成任务，动作迅速”，“比如遇到国军，该部因避战之故，马上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不见了”，“该部对于其主义，信仰极深，故拥护首领，甘心效死疆场。”另一份则是白崇禧对桂系十五军的训话。他说红六军团的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心。”至于桂军为何没有追上红六军团，他认为这是由于桂军存在四条“短处”：“第一行军弱，有些官兵不能走路……这次追赶萧克，暴露了这种弱点；第二是有少数的官兵胆小，借故落伍，不肯上前；第三是后方勤务不好，行动不敏捷；第四是通讯不灵”。

红军的长处，当然不止于此。但从敌人公认的这几点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部队在西征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奋战的战斗作风和精神

风貌。当然，我们的胜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失是很大的。先烈们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鞭策我们幸存者更加谨慎、周密，更加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去战斗。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向南腰界转移途中，任弼时、夏曦、贺龙等首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商定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于当天电呈军委说：

“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 800 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 3 [个] 团，总数约 3000；二军团为七、九两师，总数约 3200，精良充足，但子弹缺乏。

“任与夏、贺商议，二军团以下七、九两师编成 3 个团，独立师编 1 个团，共 4 个团；六军团暂编 3 [个] 团。两个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萧随二军团，夏、王、李随十七师。

“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向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sup>(2)</sup>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贺总和关政委对六军团非常关心，多次指示二军团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照顾好六军团，保障好六军团。二军团的指战员，按照贺、关首长的指示，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筹粮、送肉、送盐，组织人上山选割细软的茅草，给我们当铺草；给我们营以上干部配备了乘马，还拨给我们七八挺轻机枪。这些无私的援助，感人至深。

10月26日，二、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标志着两个军团胜利地结合在一起。

### 三

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说二军团，由于夏曦同志盲目地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在部队中搞肃反扩大化，屈杀了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甚至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sup>〔3〕</sup>；在军事上，亦曾犯过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使部队和根据地受到了很大损失。二军团的电台坏了以后，同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中央对二军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夏曦当时的职务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又一直不承认他的政治错误，以贺龙、关向应的身份，是不能左右夏曦的。六军团出发前，任弼时同志即已受命于中央，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前往解决二军团的问题。

再说六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中途几遭敌军重兵的追、堵、截、围，部队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只剩下3000人左右，其中还有300多伤病员。会师前，为了轻装，连行李都烧掉了。因此，我们亟需休整、补充。

正如贺龙同志所说：“我们二、六军团两个军团会师以前都是多灾多难的，肃反都扩大化，干部损失最大。所以，两军都希望会师。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如果没有（黔东）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丢光了，很狼狈。”

但是，由于军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上述情况，于10月26日急电“任、萧、王”：“一、二、六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二、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六军团所携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个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

二、六军团首长，包括夏曦在内，接此电令后，都认为二、六两军团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分开行动的，因此不同意分开。为让中央

及军委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先于 27 日汇报了夏曦在二军团（即红三军）所犯的严重错误：

“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把]9/10 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最近到白区配合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苏区缩小到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 30 里，人口 3 万余人；20 个区缩小到 12 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 3000 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由于夏曦同志“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军委会的主席，萧、任副之。”

第二天，“夏贺关任萧王”又电呈军委，详细申述了两个军团需要统一行动的理由：

“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记得这样反复了几次，军委才同意二、六军团共同行动，调夏曦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关于二军团的政治路线问题，由于贺龙、关向应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夏曦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得到纠正，并于 6 月中旬恢复了党团组织。只是党团员敢于站出来登记的还不多。弼时同志到二军团了解情况后，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促进了二军团的政治生活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

两个军团会合后，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统一指挥二、六军团。贺龙对六军团是非常尊重的。他曾带着二军团的一部分干部到六军团来学习，诚恳地对萧克和王震同志说，你们军团来自



中央根据地，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普遍比较高。二军团的干部，大部分在肃反中被错杀了。新提起来的干部，特别是营团级干部，素质差，经验少。希望六军团能支援二军团一批干部。萧克、王震同志欣然同意，立即选调了一批同志到二军团工作。如甘泗淇、方理明、张平化、袁任远、余秋里、朱辉照、冼恒汉等同志就是这时调到二军团的。萧、王首长对二军团的能征善战也十分钦佩，要求贺龙、关向应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六军团工作。

贺龙同志还请弼时同志给二军团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介绍中央红军反“围剿”和土地革命的经验。

贺总听说我懂得一点儿军事训练和参谋业务，也曾经让我给二军团的干部讲课和做示范动作，还叮嘱我帮助二军团司令部搞好业务建设。不久，又调我担任二军团参谋长。

这样一来，二、六军团就融合在一起了。大家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一般，无形中增加了几倍的力量。贺龙同志说：“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个会师的模范。”

为策应长征，我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敌人发动了攻势，在运动中歼敌数千，相继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地，于11月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任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贺龙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又于1935年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9日，两军团主力由桑植出发，又走上了伟大长征的新阶段。

## 注 释

〔1〕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简称“中革军委”。

〔2〕乾、松、凤地区，指地处湘黔边界的湖南省乾城县（1953年改名为吉首